

20060918

书评一则

书名: 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

作者: John Pomfret

出版社: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

王友琴

John Pomfret 是《华盛顿邮报》记者，2006年出版了《中国课：五个同学和新中国的故事》一书。1981年他21岁，作为1949年后首批成为中国大学本科生的美国人之一进入南京大学。2001年他参加校友重聚后就开始写这本书。他写了他的五个中国同学，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在对个人所作的肖像性描述之中，他也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总体历史，包括改变和延续两个方面。

这本书出版以后，已经发表了若干英文书评，因而我想特别侧重谈论自己比较了解的一个方面。我做了大量采访调查，写过一本五十万字的书《文革受难者》，记载六百多名被文革害死的人。《中国课》的作者在文革后进入中国，此书的重点也不在文革本身，然而，这本书对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有非常独到和深刻的描述以及剖析。文革开始于四十年前，应该承认，在中文写作中，总的来说对文革本身以及受难者还缺乏历史记载，对文革后人们如何记忆历史以及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就更不见深入具体的观察和描述了。仅仅从这一个角度，这本书对理解文革和文革后历史就非常有帮助。

2004年春天，我收到此书作者寄自北京的电子信，说他在写一本书，书中人物吴晓晴的父母在1966年被红卫兵打死，另外，他还问我是否能提供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南京的情况。他大概是从我的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得到我的电邮地址的。

我的一个看法是，文革历史研究之所以没有能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准，原因固然有多项，但是缺乏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和讨论是其中之一。所以对于请我帮助的人，我总是尽力而为，不但帮助别人解决具体问题，也希望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来推进学术研究风气的养成。所以我很快开始动手查找材料并给他回信。

Pomfret所说的被打死的父母，名字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多年前我已经做过调查并写成文章放在电脑网上。据我的调查，这对父母是文革中全国最早在暴力型“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文革前，李敬仪是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吴天石是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是被中共江苏省委最早“揪出来”的文革打击对象之一，尽管不久以后那些省委领导自己也被“揪”了出来。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拉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中，召开“批斗黑帮份子大会”。一群干部和教师被拉到台上“斗争”。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

接着，他们又被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着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横拖着，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一里来路。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吴天石在8月5日死亡。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

这是文革进程中最为野蛮血腥并有重大标志意义的一天。两天以后，发生了北京第一起教育工作者被杀害的事情。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文革通过“革命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之手大规模杀人，就从此时开始。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在文革后发表的其自传中提到，当时他曾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吴天石被打死一事。非常明显，这种暴力迫害和杀戮是在文革最高领导人的鼓励和指导下去进行的。8月3日的“革命行动”杀害了两个人，但在文革时代这一天被引为自豪。南京师范学院“造反派”组织起名叫“八三革命造反师”，该组织建造的毛泽东塑像高度是八点三米。这种对八三数字的反复强调，是在反复肯定那一天的行动所代表的暴力迫害的思想。

我给 Pomfret 传去了我写的这篇报告，还告诉他该文章收在我的新书《文革受难者》中，书正在香港印刷中。很快又收到了他的来信，说他已经从香港买到了书。从时间算，他该是最早购买这本书的人之一。当然，他是驻北京的美国记者，买香港出版的书不是问题，普通的中国人就没有办法买了。然后他问我，在我书中“李敬仪”一篇中写到的那个曾在1966年8月3日积极参与殴打李敬仪吴天石夫妇而在1999年死亡的外语教授，会不会是李敬仪吴天石的孩子为了报仇雇佣了杀手把他杀死的？

我被问得一头雾水。尽管采访了大量的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亲属，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文革受难者的孩子雇佣杀手报仇的。不但没有报复那些作恶者，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敢向人讲述父母的悲惨遭遇，因为仍然心怀恐惧。记得2001年我访问一位父母和姐姐都被红卫兵打死的女士时，她说，她的几个朋友和亲戚曾经力劝她不要和我谈话，以免引起麻烦，可是她想过以后还是决定了和我谈话。她说：“我还不甘心。”我一方面感谢她的合作和坦诚，另一方面也被她所说的“不甘心”一词所搅动。“不甘心”后面的宾语词是什么？是不甘心不大声抗议？是不甘心不向公众控诉？是不甘心不采取行动反抗罪恶？是不甘心不要求惩罚凶手？是不甘心不诉诸法律寻求司法公正？都不是。她说的“不甘心”仅仅是不甘心拒绝我的采访。

“不甘心”后面的行为宾语如此卑微，不能不使我感到怅惘。

我赶快翻开《文革受难者》书重读“李敬仪”条目。这篇文章的倒数第二段如下：

一位受访者说，1999年，南京师范学院外文系一个风流倜傥的男教授，在苏州突然暴死，尸体在室内一周无人发现，以致腐臭，死时年纪不到60岁。他的在校学生都为此深感遗憾。但是学校中年纪较大的人中有传说，这

是报应。当年打死吴天石夫妇，这个人很积极。文革后他也没有为此受惩罚，但是老天还是要算账的，哪怕是 33 年之后。

我对这种传言的理解是，人们在通过曲折的方式表达藏在心里的惩恶愿望。给我讲述这一传言的人认识吴晓晴。我曾经托过他和另一读者与吴晓晴联络，希望了解关于他的父母之死的更多情况，至少请他把我已经写好放入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关于他父母的文章校读一遍，以免有错。特别是在我听说吴晓晴现在是大学的历史教师时，更觉得可以请他这样做，因为不需要跟一个历史老师解释书写文革历史的重要性，何况这历史和他父母被害有关。可是，数年过去，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

Pomfret 先生显然是这段文字中的“暴死”误解成“用暴力杀死”了，因而提出了那样的猜测和疑问。我向他作了解释，“暴死”只是突然死亡的意思。我毫无嘲笑他的中文不够好的意思，其实倒是钦佩他的细心和认真，所以才会那样发问。而且我也明白，这个问题并不是纯粹因词语误解才被提出的。在他生活的社会中，JUSTICE，通行的中文翻译是“正义”，和自由、人权、道德一样被视为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罪行就应该被带到“正义”中来审判，不能够几十年任人不管。我想这是他会有这一猜测和疑问的主要原因。

等我读了他的这本书，我进而意识到他确实并没有因为一个生词而误解了什么。他的行文表现了他对受难者的孩子们有很深的观察和理解，能相当准确地把握其心态。而且可以说，还没有哪个本无语言障碍的中国作家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书中写到：

1966 年 7 月 14 日，江苏省报点名批判吴天石，也就是在政治上判了他死刑。吴晓晴和其他孩子一起在家里写大标语“打倒吴天石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教育路线”。他告诉 Pomfret，那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8 月 3 日吴天石夫妇被打死时，吴晓晴正在郊区农村劳动。他偶然听到两个中学生谈论师范学院打死了两个人（是用醉心的赞扬的口气谈论的。——Pomfret 特别说明了这一点，这表现了他对当时情景的了解），竟是他的父母。他立刻进城回家，看到他的姐姐。他 15 岁，姐姐也是中学生。姐姐教他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就说母亲死于高血压父亲死于慢性肝炎，因为说父母是被红卫兵组织打死的会让子女成为革命的对立面。两个人都没有哭。

他们的家成了红卫兵司令部。他们被赶出了门。然后吴晓晴像其他一千八百万青年人一样被送到农村插队。1971 年林彪死后，一些老干部复职，给一些已经被打死的人平反，吴天石也在其中。这样吴晓晴得以离开农村参加了军（当时这是一般人得不到的机会）。1975 年，他在军队加入共产党。在入党申请书中，他再次说他的母亲死于高血压父亲死于慢性肝炎，还说他父亲因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执行了修

正主义路线。他说他知道他这是在说谎（他父亲的尸检报告说身上骨折就有六处，还有其他各种伤），但是他说这样做有助于“改善我的生活”。

文革后吴晓晴成为南京大学 78 级学生，毕业后他到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书。他父母被这所学校的人打死。打死他父母的人从未被起诉。他和其中有的打人者会常常在校园路上对面走过。2003 年，他们系里为了赚钱要编历史教科书，把文革这一段分派给他写。他自己写了一些段落，可是没有通过上面的审查，于是删去，改成上面规定的关于文革的那些套话，尽管那些话离开历史事实很远。1989 年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后，他被推举为该校清查委员会成员对参加学生运动的人进行“清查”，他做了，尽管是最不起劲的清查者。对于这类事情，他总是解释说，是因为“没办法”。

书中还写到，假如说吴晓晴怯懦，他是一个有勇气坦承自己的恐惧的人。是吴晓晴自己告诉了 Pomfret 这些事情。这一点使 Pomfret 觉得吴晓晴在悲惨的同时也有了英雄性的一面。

这位作者依照当年在班里的习惯，在书里称吴为“老吴”（77、78 级大学生之间年龄相差很大，吴是年龄较大者）。“老吴”因为老，因为家庭遭遇，与过去的历史比年轻同学有深得多的关系。但是他也指出，在他们那个班里，“老吴”却是最为通晓电脑网、电子邮件、电子短信这些现代装备的。虽然“老吴”对父母之死没有作什么，但是显然还在留心 and 收集着有关历史的种种信息。

读着书中对一个人的这种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使我仿佛觉得在读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比如俄国小说里的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罗亭（屠格涅夫）等等。俄国作家在这方面才华突出，他们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人道精神体现在这些作品中。另外，我参访过大量的文革经历者，自以为有一定资格了解这样的人物的典型性。在一种非虚构类作品中能达到这种效应，是很了不起的。

在书中，Pomfret 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他的同学的行为让他困惑。他写道：

假使我的父母被政权杀害了，我会投入我的生命来复仇，来从事政治活动，至少，要把省公安局秘藏着的证据都挖掘公布出来。为什么吴晓晴不这样做？他的正义（JUSTICE）感在哪里？为什么在中国这种事情的结局总是坏人——准确地说是谋杀者——得以脱身？（113 页）

我想，Pomfret 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 JUSTICE/正义问题。一般人都认为，文革受害者们保持沉默忍气吞声，是因为他们受到权力当局的压制。这一解释无疑是对的，然而不是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充分理由。在文革发生时，吴晓晴姐弟知道父母是被打死的，但是却说是“高血压”和“肝炎”死的，那时候他们得自保，没有选择的自由。然而后来，特别是文革结束几十年后，实际上存在着选择的余地。当

有可能采取别的行动的时候没有作，社会和个人是否有 JUSTICE/正义就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原因。

无独有偶，在吴晓晴父母被害两天之后在北京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长期以来也被一些红卫兵说成是“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当然，她们这样说主要是为了掩饰红卫兵的罪行，和吴晓晴姐弟那样说动机不同。但是，在卞仲耘遇害几十年后，还有人还可以这样说或者写，读者也只有这样听和看，显然也表明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人们对 JUSTICE/正义的忽视和麻木。40年前在校园里打死一个人（何况这个中学的校园里两个星期后又打死了另一个人），这一类案子早就应该得到正义审判，而不是像在谈论是什么人打破了一扇窗户，还是那扇窗户本身已经太旧不结实。

追究根源，摧毁了当代中国人的 JUSTICE/正义观念的根源，还是文革。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更多的人被“斗争”、被监禁、被打伤，这是对社会 JUSTICE/正义的绝大冒犯和损毁。但是残暴行为在当时被用革命的名义合理化了，在文革后又用“认识错误”的说法减轻淡化了。确实，文革的事实长期以来没有被说清楚，这是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但是同时，这也不只是个说清事实的问题。文革的大多数事实一点都不神秘，比如李敬仪吴天石夫妇被打死，就是在数千人眼前，在校园里和南京城市中心发生的。这些事实长期得不到记载和说明，是由于当局的禁止，也是因为整个社会 JUSTICE/正义的衰弱。而正义感的消退使得对抗官方禁止的民间力量三十年来难以形成壮大。吴晓晴父母被害的事实，卞仲耘校长被害，这些被认为是“小事”或者不重要的事而一直被排斥在文革历史的记载和研究之外。这不是由于语言或者知识的障碍，而是因为判断罪与非罪、善与恶的原则出了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Pomfret 这一套不过是美国人的想法而已，和中国实际离得太远。这是非常轻浮的否定方式。首先，在 JUSTICE/正义这样的人类社会的基本概念方面，难道要分美国和中国吗？其次，实际上在美国，JUSTICE/正义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有这样重要的位置，能保障社会的和平与进步，也是人们长期努力的结果。可以说，对吴晓晴的探索，也是在维护对人类无比重要的一个价值理念。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特别推荐千千万万受难者的孩子们阅读这本书，思考书中提出的命题。